

“30岁啃老,科研没前途”

■本报记者 甘晓

“很多年轻的科研人员,到了30岁还在啃老族,这说明我们的科学研究体系一定是有问题的!”在6月10日晚于京举行的两院院士大会学习李克强总理重要报告座谈会上,中科院院士杨玉良说到这里时,突然抬高了嗓门。与会的其他院士把目光都聚集到他身上。

就在当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李克强指出,创新驱动根本要靠人才。要进一步破除阻碍人才成长和施展才华的各种障碍,弘扬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营造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充分激发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

的创新活力。谈起“青年人才”这个话题,身为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玉良深有感触。他说,在学校里,一批没有获得过任何人才计划的年轻人每月收入最多只有5000多元。

在杨玉良看来,与获得过人才计划的科研人员相比,这批年轻的科研人员并非不优秀,但其收入比前者低太多,甚至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面对的是四位老人、一个或两个孩子,租房都比较困难,更别提买房了。”杨玉良颇为痛心地说,“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

讲到这里,会议室的气氛突然有些沉重。院士们有的沉默不语,有的默默点头表示同意。他们纷纷认为,不能因为强调各类人才计划而忽视了其他科

研人员。

“当前,如果出于种种原因没有获得人才计划,从事科学研究得到的收入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并不大。当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不匹配时,科学研究作为职业的尊严就没有了。”杨玉良接着说,“这样的状况对这批年轻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严重影响了他们在科研上的积极性。”

同是大学校长的另一位中科院院士侯建国指出:“当前,我们已设置许多种人才计划,给年轻人各种‘头衔’。但是,这些头衔实际上是竞争性的,使年轻人人都去争取这个头衔,而不是做事情的机会。”

为此,他建议,应按照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认真制定人才培养计划,为

年轻人营造一个健康的氛围,让他们在宽松的氛围内得到支持和成长。

“国家的全面发展,西部是不可忽视的。但正因为经济不发达,30多岁的年轻人看到东部、南部好,很多人都跑了啊!”来自西部的中科院院士舒德干则建议,应给西部青年人才设立特殊政策。

“在国外,青年人才精力最旺盛,创造力量最强的阶段,是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的那段时间,即博士后阶段。正好我们国家在这个阶段最弱。”中科院院士吴岳良建议,应重视博士后培养。

晚上9点,北京夏天的天空已经黑尽,会议室里仍热闹非凡。在这里,有关人才培养的话题一打开便关不住了。为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院士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为青年人才培养献计献策。

会场花絮

三遇“中国核潜艇之父”

■本报记者 陆琦

“小陆,你好,又见面了。”中午,在北京会议中心9号楼的餐厅外,一对伉俪微笑着向记者走来。原来是“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院士夫妇。

“小苏州,你也来了啊。”黄旭华的夫人李世英用上海话跟记者打招呼,吴依软语听着倍感亲切。

这是一个月内,记者第三次与黄旭华见面了。

5月24日,昆明,在第十六届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记者初次见到了黄旭华。眼前这位老人,一头银发,和蔼可亲,对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话题有着自己的观点。“促进产业升级,科研和产业发展不可分割,但是应该各有各的独立性,两者的结合应该建立在独立的基础之上,而且不能去复制某个模式。”

那一刻,记者还不知道这位说

话字字铿锵的院士,就是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总设计师。

有幸的是,3天后,记者又有了一次深入采访黄旭华的机会——跟随中国工程院来到中船重工719所对他进行人物专访。看似平凡的老人却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为什么能够为国之重器研制隐姓埋名一个甲子?为什么能够在那个一穷二白的时代书写共和国核潜艇从无到有的历史?因为对黄旭华来说,核潜艇就是生命的意义。

没想到,在这次院士大会上,记者又一次遇到了黄旭华。“虽然作为资深院士可以不参加,但今年是中国工程院建院20周年,也是中国科学院成立的那一年,黄旭华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相见不相识

■本报见习记者 王珊

“杨老师,您还记得我吗?”记者远远看见来自合肥工业大学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善林,于是很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杨善林是2013年管理学部新当选院士。当选结果发布以后,我曾经电话采访过他。电话中的杨善林令人感觉亲切和善。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他的学生——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梁樑结识。对于自己的导师,梁樑很佩服,在他眼里,老师在工作上很“玩命”,对待学生很尽责。

种种印象叠合起来,让我非常想见杨善林本人,今天恰巧遇到,不能就这么错过了。不过,尴尬的一刻也在此时发生了。

“你,你好……”杨善林的脸上和

话语中充满了疑问,他肯定是在大脑中思索,啥时候见过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姑娘。

瞬间,我也有点尴尬了,“您不记得我了,我就是那个您当选院士时,采访过您的记者,咱们通过电话。”

“哦,好像是。”杨善林应该还是没有想明白我是谁。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做的就是赶快“遁”地逃走。

之后,我又在会场或者餐厅碰到了几次杨善林,不过,估计他已经记住了我,每次见面的时候都会冲着我笑一下,打个招呼。倒是我,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类似的事情,在这次大会上发生了不止一次,可能是我太热情了吧,见到自己曾经采访过的,或者比较敬佩的院士,总想过去打个招呼。



▲时隔两年,相逢盛会,张锦秋院士(右)带来了自己的学术专著赠送给即将离会的邹竞院士。

▲图为6月11日院士大会全体会议会场。

李星杰摄

现场直击

“不能像管生产那样管科研”

■本报记者 陆琦

今天上午,两院院士齐聚北京会议中心,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重要讲话。近两个小时的报告曾两次引发全场院士热烈鼓掌。其中一次,刘延东在谈到科研经费的问题时说,项目在研期间,年度剩余资金可以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掌声随即响起。

“为什么大家都鼓掌?就是因为科研人员在科研经费的问题上吃尽了苦头。”中国科学院院士钟南山在会后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现在释放了改革的信号,大家非常高兴。”

钟南山说,过去科研经费下得很晚,不到半年就要上报“是怎么用的”,多余的就要上缴,而且第二年再拨经费需要参照前一年的使用情况。“这给科研带来了很大困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个问题已经给广大科研人员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校长郭东明直言:“科研不能按照生产来管理。”他表示,科研过程往往是未知的,科研过程中遇到困难、问题在所难免,不能够一步完全按照计划来实现。“走一走,要调整。”而且,不能说科研一定能成功,因此科研经费不能像生产那样一成不变,要求到什么时候一定要完成。

“科研经费管理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国家科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郭东明说。

目前,科研经费管理有很多条条框框。郭东明告诉记者,现在学校里许多科研人员都反映,要作研究,首先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弄明白科研经费到底应该怎么用。大家都担心,如果花不完,就要被收回,那就没法作研究了。“这是人力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

此外,科研经费使用中“重物轻人”的现状也是院士们特别担忧的。

“对科研人员的支持不单是无形的,还要有形的。”钟南山说,“科研经费只能用在仪器设备上,不能用于科研人员的劳务费、出差开支等。这肯定不合理。”

在郭东明看来,真正的科研在于作好研究,而不是在于有多好的设备。“过去大量经费都是买硬件,忽视了软件人,而人力资源恰恰是科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他建议科研经费中应该增加人力使用成本。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淦德说,现在科研人员“人头费”太少。“像我,一级教授,除去岗位津贴等,每个月就五千多块钱。那些四五级教授就更少得可怜了。”

年轻的科研人员都没有了积极性,

怎么办?王淦德的回答很无奈:“其实目前,就纵向课题而言,我已经排得很满了,完全可以不用做横向课题,但我还是去积极争取横向经费,并且鼓励年轻人参与一些横向课题,为的就是在横向经费里多给年轻人一些补贴。”

“纵向经费限制特别严,作为课题组长没有什么权力,这甚至都影响了科研的顺利进行。”王淦德说。

王淦德专攻人机与环境工程,经常要给航天部门做地面试验设备,这就涉及土建、施工等。“有的时候工程很急,需要在当地请一些临时工帮忙,不给钱,就没人给你干。任务十万火急,可是我这个课题组长却没法从科研经费中拿出一些钱给工人发工资。”

王淦德建议,科研经费中需要有一些课题组长能够灵活掌握的部分,特别对于一些工程性的课题。“切忌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钟南山对此表示认同。他说:“科研经费给了你,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科研成果怎么样,而不是经费用得合理不合理。不要管经费怎么用,按照计划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卷,这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按照科学研究的发展需要和客观规律进行科研经费管理。”郭东明强调。

(上接第1版)

“这把科学道德放在了比较高的位置。”卢耀如表示,院士道德有问题或做了一些有不好影响的事,有道德检查,让犯错误的、不够格的院士退出去。“这两年对科学道德的关注很多,把这个列入章程并放在重要地位,也是对社会的一个回应。”

沈国防认为,“劝其放弃院士称号”比笼统的劝退说得更清楚,而且跟“撤销其院士称号”拉开了距离。

“院士有问题可以自己退出,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使其退出院士队伍。”卢耀如补充道。

对此,赵振东直言,院士做得不好,当然要把称号拿掉。如果不拿掉,不仅会污染院士团队,还会污染社会。如今,在院士章程中将其明确,就“有法可依”了。

把最优秀的人才推出来

在院士增选机制上,借鉴国际上院

士选举制度的普遍做法,中国工程院的新章程中明确:将在候选人所在学部范围选举投票的基础上,增加全院院士终选投票环节,以此考察候选人在更广学术范围内的认可度。

卢耀如指出,新的院士遴选制度主要强调以学术贡献为主。一方面,摆脱一些部门机关单位的干预,可以更加公正。另一方面,以前是哪个学部推荐出来就算哪个学部的,现在还要在全院院士大会上投票选举。在投票中,院士们可以对候选人提出异议,别的学部对其有认识了解的人觉得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院士章程的实质是求人才、推人才。排除任何干扰,把优秀的人才推出来,这是最终的目的。”赵振东说。

“章程的文字虽然很简略,但目的很清楚。”赵振东表示,制定制度是为了让院士的道德水平能够更高。逐步改革,努力把弊端排除,才能让其做得更好。

(上接第1版)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其实院士们在意的并不是退休与否或者所谓的“院士名分”,他们在意的是“解甲归田”后能否继续如常耕耘。

“退不退不重要,剩下的这点精力不想乱折腾,学生们都很厉害,事情留给他们做很放心。”77岁的中科院院士、海洋学家冯士筴告诉记者,院士退休后可以继续搞研究、搞战略,“工作不一定都是在显处,很多可能是在隐处”。“我这个‘老古董’,现在就希望重返‘象牙塔’,安安静静地教书育人,继续探索和研究。”冯士筴笑着说。

被异化的荣誉

有观点认为,院士凭借荣誉和权利垄断学术资源,左右一些重大项目经费的流向,阻碍了国内科研发展和创新。“但我的亲身经历却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议申报项目的时候,无

解决“死读书”须靠长远之计

■本报见习记者 王珊

“工程科技人才存在着严重的供需矛盾。”6月11日,在中科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全体会议召开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土王家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013年,全国毕业生数量达到699万人,较2009年增长了14%左右,然而近几年就业人数的增长率却远远低于此数据,只有4%左右,其中工科毕业生的就业增长率也不高。

根据用人单位反映,工科毕业生,无论来自重点院校还是普通院校,普遍存在着动手能力差、专业面窄等问题。

一方面企业需要大量优秀工程师,另一方面,学校有着大量急需就业的学生,但是学校提供的学生却无法满足企业的需要。这个打不开的结,让院士们很头疼。

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高峰分析,教学环节不适应工程特点,教学中缺乏实践环节是导致问题的重要原因。

随着学生规模的扩大,工程对实践环节的要求与学校现实实践条件之间存在很大反差。很多学校试验条件原本就不足,而随着试验分组规模的扩大,学生动手的机会越来越少,本应“实践第一”的工科教育变成了“死读书”“读死书”。

学校教学条件不足,寻求外部合作,

与企业联系是补短的绝佳途径。然而,院士们指出,目前,学校与企业之间联系普遍薄弱,学生参与到生产实践的机会也非常少。

究其原因,院士们指出,学校既有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存在问题,即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不够重视,从而导致了教育与市场对接不上。

宇航科学与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土于本水的孙子在加拿大读大学,五年学制,而一年三个学期中,有一个学期是到企业中进行实践。

“这样,孩子出了校门后,就能够直接步入工作正轨。”于本水说,国内学生的培养过于注重理论建设,学生毕业后,还得企业现学现教,企业追求利益的迅速产出,所以不愿意用。

此外,在院士们看来,企业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家耀说,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有联合高校培养人才、为学生提供生产实践机会的责任,但现在这种责任仍没有被明确,大多数企业缺乏这方面的意识。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提供实习的企业也不一定能够达到原定的实践培养目标。

首先,国内大企业为数有限,接纳实

很多操作都已自动化,因此,企业需要为实习的学生设定专门的实习环境,而这需要相当的投入。

其次,国内广大中小企业大多仍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只能安排一些部件组装等简单操作,也难以让学生进行真正的实践学习。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将期望寄托于学生的自主创业,希望学校能够加大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

然而,中国科学院院士沈祖炎不赞同这种做法。“从事工程工作必须要有大量实践的积累。”沈祖炎说,刚毕业的学生缺乏足够的工程经验,让他们创业勉为其难,不是解决供需矛盾的长远之道。

要想更好地解决问题,院士们说,必须要产学研结合,校企合作两手抓。

朱高峰说,学校要加快探索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的途径,精心组织好学生去企业参加实践活动,务求在学生真正学有所成的同时,使企业也能从中受益,实现双赢。

王家耀则表示,必须要推动立法,明确企业培养人才的社会责任。与此同时,必须尽快实现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式转型,扩大对工程人才的需求,这样教育中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院士制度改革:不仅事关信誉危机

论对院士还是其他科学工作者都一视同仁。大家都是平起平坐地竞争。”中科院院士崔向群告诉记者,在她身上就发生过申请项目未获通过的事情。她曾经申请过一项天文学重大仪器专项,最终没有通过。

“这没有什么难堪的,而且还有院士报奖没有通过的,这说明学术资源并不是由院士垄断的。”崔向群说。

另一个饱受争议的现象就是院士队伍的行政化问题。有观点认为,学术与权力挂钩,滋生了学术腐败。而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不少院士则表示,聘用内行专家担任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领导正是我国社会进步的表现。“一直以来,我国都是外行领导内行,现在好不容易进步了,难道又要退回去?”中科院院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

长郑晓静走在校园里,经常会有学生跟她打招呼,一句简单的“晓静姐”让她感到既亲切又自豪。“他们叫我晓静姐,说明在他们心中,我不是什么官员。”郑晓静如是说。

“院士队伍中不排除有学霸,但这只是个个别现象,不是整个院士群体,更不能牵扯到院士制度上来。”崔向群如是说。

回归“学术”本色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进行院士制度改革,要求突出学术导向,减少不必要的干预,改进和完善院士遴选机制、学科布局、年龄结构、兼职和待遇、退休退出制度等,以更好地发挥广大院士的作用,更好地发现和培养拔尖人才。

对此,中科院院士、信息与通讯系统专家王越表示,院士制度改革符合实际情况,让院士回归学术本位也是大势所趋。“十几年来,我国最高科技奖得主无一例外全都是两院院士,这说明院士群体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同时指出,为了维护院士队伍的荣誉,撤销院士称号的做法在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

过去,钱学森、邓稼先、裘法祖等一批老科学家克服万难,回归祖国,在推动国家科技发展的同时,不忘提携后学,培育新人。而今,很多院士依然用行动诠释着朴素求真的“学术”本色。

采访中,多位院士提及,在院士队伍改革的同时,还应直面一些深层次的学术问题,如社会广泛关注的学术腐败、科研经费管理使用、学术过度行政化等。革除这些学术制度陋习,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实现以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